

蒲松龄与墨子论略

杨玉军¹ 王惠²

(1. 枣庄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 山东 枣庄 277160;

2. 枣庄经济学校, 山东 枣庄 277160)

摘要:墨子与蒲松龄作为同是闻名齐鲁大地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墨子对蒲松龄有无影响,是一个较少被人关注却又是很有意义的话题。本文从“兼爱”思想、侠义思想、鬼神思想、商业思想和实干精神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墨子对蒲松龄有着潜移默化影响,认为二人在思想和行为的许多方面都是相似和相通的。在后人的眼中,墨子和蒲松龄都是脚踏实地的平民圣人。

关键词:墨子;蒲松龄;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30/j.cnki.1002-3712.2019.02.002

一、蒲松龄与墨子——一个新鲜而又很有意思的话题

蒲松龄与墨子,这算得上一个新鲜且很有意思的话题。说它新鲜,是因为有关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研究似很少涉及这一话题。在知网等机构检索了一下,发现只有一篇文章,即郑春元先生发表于《蒲松龄研究》2017年第一期的《略论〈聊斋志异〉中的墨家思想》是专门论此问题的,其他有关论文则尚未发现。这与论述蒲松龄与儒家、道家、佛教等学派的关系、影响等方面的大量文章恰成鲜明的对照,这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

收稿日期:2018-12-24

作者简介:杨玉军(1963-),男,山东兖州人。文学硕士,枣庄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研究和教育教学研究;王惠(1964-),女,安徽无为。人。枣庄经济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墨子研究和职业教育研究。

说它有意思,是因为,作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蒲松龄与同为诞生于齐鲁大地的墨家创始人墨子(墨子究竟是谁人迄未定论,主要有两说,一为“宋人说”,即今河南鲁山人;一为“鲁人说”,即今山东滕州人。但窃以为即便墨子故里不是山东滕州,他青年和中年时期的活动足迹也大多是在山东一带,墨子和齐鲁大地的渊源可谓深矣)二人在思想上有无某种交集?蒲松龄对墨子持什么态度?墨子对蒲松龄有无影响?这应该是一个十分自然而又很有意义的话题。

与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聊斋志异》一样,蒲松龄的思想意识也是复杂和多样的。除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外,佛家和道家思想都对其有一定影响。其思想意识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并辅之以佛家轮回转世、善果恶报思想和道家学派的神仙道术思想。

作为与孔子、老子分庭抗礼的墨子,那墨子和墨家思想对蒲松龄有没有影响呢?遍览《蒲松龄全集》,无论是其撰写的各类文章、诗歌作品,还是其小说集《聊斋志异》,却绝少提到墨子和墨家思想,只有一篇八股文论及墨子。下面是其文章中不多的几处间接引用了墨子的观点:

“譬之丝染,苍则苍而黄则黄;若彼路歧,南愈南而北愈北。”(《拟士习表其三》)^①其中前半句出于《墨子·所染》。

“敬天勤民,致海河之清晏;爱人节用,念稼穡之艰难。”(《拟上以河工告成,躬亲巡视,兼念山左饥荒,连年蠲赈,民困新苏,即以省问疾苦,群臣谢表》)其中之“节用”明显是墨子的观点。

遍览《聊斋志异》,全用文言写就,作者学养丰厚,博览群书,往往旁征博引,用典用事,常信手拈来,令人叹为观止。仅就先秦著作看,取之于《诗经》《楚辞》《左传》等较多,而诸子著作中,《论语》《孟子》《庄子》等引用较普遍。依据朱其铠先生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笔者粗略统计,蒲松龄共在全书近500篇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庄子》一书达67次,《孟子》51次,《荀子》8次,《韩非子》6次,而引用《墨子》仅有2处(实为1处),具体为:

1.《红玉》:“女笑曰:‘妾诳君耳。今家道新创,非夙兴夜寐不可。’”见《墨子·非乐上》:“夫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朱其铠先生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此处可能有误,“夙兴夜寐”一词最早实不见于《墨子》,而是见于更早的《诗

^①本文所引蒲松龄著述均出自《蒲松龄全集》,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经·卫风·氓》：“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2.《云萝公主》：“女挽手曰：‘君不信数，遂使土木为灾，又以苦块之戚，迟我三年琴瑟。’”中“苦块”为“寝苦枕块”之略语，见于《墨子·节葬》。

《蒲松龄全集》中只有一篇文章是直接论及墨子，即八股文《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此是一篇命题作文，是蒲松龄康熙二十三年参加山东乡试的制艺之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一题目是孟子批驳杨朱、墨子的原话，蒲松龄该文，自然是循孟子之义而批驳杨朱、墨子。兹引这篇八股文部分句子如下：

闲其道者即其徒，大贤重望其人焉。盖惟圣人之徒，能闲圣人之道，言距杨墨，孟子所以深望耳。……然圣人虽往，而遗泽未泯。苟得一人焉，尊其道而续其流，则千古之圣人至今存可耳。予不得已而好辩，盖不得已而言者也。使予无言，恐一二人之言，且遍天下也，而宁不赖有距之者。抑不得已而有言，盖不得已而距杨墨者也。使人尽如予言，则一二人之言，将废然而返也。而宁不望有能之者。能言距杨墨，我思其功，我怀其人矣。王迹既息，而为我兼爱之说，深入乎人心，知其非者何人哉？而若人者独能于群言淆乱之中，立一说以自据。而同者收之，异者斥之。若曰前有千古，我将继焉。……雅诗既降，而无父无君之学得中乎世道，独行其是者几人哉？

孟子深感自己处在大道败坏的年代与社会中，作为圣人之徒，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捍卫圣人之道，积极纠偏改正，要与杨朱、墨子等“异端邪说”“无父无君”之论作坚决的斗争，所以他说自己“好辩”是“不得已”的。而蒲松龄也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孟子一边的，他直斥杨朱、墨子的“为我兼爱”之说，愿意像孟子一样勇敢地与这些异端邪说作斗争，使这些“一二人之言，将废然而返也”。

这些话是否为蒲松龄由衷之言，实在不好判断。因为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命题作文，完全是为圣人代言，蒲松龄自然不敢也不可能和孟子老夫子唱反调的。蒲松龄在其言论和著述中，应该是有意无意地和墨子拉开距离的。在儒墨对立的背景下，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作为孔子、孟子坚定不移的信奉者和追随者，蒲松龄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公开称颂、赞扬墨子和墨家思想，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墨子和墨家思想对蒲松龄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蒲松龄自己没有承认，当然即便有也不会直接承认，但细察其著述、特别是《聊斋志异》，再联系蒲松龄自身的事迹行为，不难得出结论，墨子和墨家思想对蒲松龄的影响还是十分显著的，这表现在二者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在许多行为上也是相似的。

二、墨子的“兼爱”思想与蒲松龄的仁爱情怀

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论，“兼爱”无疑是其思想的核心，其他都是由兼爱衍生而来的。墨子本着“兼爱”的精神，视人类为一体，希望人人平等，不分亲疏贵贱，不分差等，有的只是贤愚勤惰的区别。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①（《墨子·兼爱上》）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墨子·兼爱中》）

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天下。（《墨子·兼爱下》）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

墨子“兼爱”的终极目标是“是以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实际这和孔子所憧憬的“大同世界”也没有什么两样。儒家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其理想世界是相同的，发挥到极致，也是殊途同归。从一定意义上说，墨家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有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力图破除小我的自私而达到对他人的关爱，只是他们之间在对他人之爱的亲疏厚薄与施爱的先后次序上是有分歧的。

墨子是有大爱心、大同情心的。惟其有大爱，才会有“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巨大的牺牲精神。梁启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称赞说：“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1]140} 孙中山先生说：“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2]244} 胡适先生说：“墨子是一个极热心救世的人，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倡为‘非攻’论。……要使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3]121}

比较一下，蒲松龄也是墨子这样具有同情心和大爱心的人。在《淄川县志》中

^①本文所引墨子著述均出片辛志凤、蒋玉斌著《墨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有蒲松龄的小传,对其评价是“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4]287}。清人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称他是“恂恂然长者”^{[4]285}。“恂恂然”出自《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①

蒲松龄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农村,具有中国农民的淳朴、善良的天性,他乐于助人,富于同情心。据说,有一年淄川大旱,庄稼歉收,蒲松龄的父亲经商又亏了本,母亲只好让他去县城富户季家借钱,季家因与蒲家关系密切,很快就借给了他三吊钱,但蒲松龄在回家的路上,为了救一个因欠债而上吊的老头,慷慨地把钱送给了他。回家后,善良仁慈的母亲没有责怪他,还称赞他说:“救人一命,行善积德。”^[5]

蒲松龄具有善良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同情心,这从他的许多诗作中可以得到佐证,他早期在同乡孙蕙府中做幕宾时,曾写给孙蕙的一首诗《牧羊辞,呈树百》:就是极好的佐证:

南山高万丈,秋雨苦淋浪。彼谁者子?箬笠来牧羊。其羊千百以为群,箠之在山岗。昼逐芟草,夜备虎狼。羊不得食殍其首,主人怒问尔何瘦我羊?稍纵之,羊入阿,食人禾。禾主来骂,牧人不敢呵。风鬣尔面,雨败尔蓑,侈指裂肤,守之不得去;不求主人赏,但愿无风波。甲子之冬冻羊死,欲求刍与牧,山中霜雪多。牧人牧人,奈甲子何!吁嗟乎!奈甲子何!

蒲松龄对人世间的痛苦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别的感受力,牧羊人在严冬中牧羊,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却引发了他强烈的恻隐之心,以至于竟发出“牧人牧人,奈甲子何!吁嗟乎!奈甲子何!”的哀悯之声,简直就是在和泪书写了。从这里可以看到蒲松龄是怀着怎样一颗伟大的仁爱之心,又是有着多么宽广的人道关怀!

作为和墨子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布衣之士”,蒲松龄关注着普通人的疾苦。他在孙蕙府中任幕宾时曾撰有一联:“古循良物阜民安,尝闻襦袴兴歌,顾兹万井寒烟,真惭黑夜;众疮痍啼饥号冻,每恨拯救无术,只此一腔热血,可对青天。”^{[6]51}这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撰写的有名的《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和大量的诗歌作品,以悲悯的心肠和沉痛的笔调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人间悲苦的场面,和杜甫的《三吏》《三别》完全是同调。而在其小说集《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真切地表现了他的仁爱精神,也塑造了大量的充满仁爱情怀的人物形象,

^①本文所引《论语》语句均出自杨伯峻著《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写出了他们身上的美好人性,表现了人物耀眼的光辉。较典型的一篇是《王六郎》,该篇写一许姓打渔人同一溺死鬼王六郎交朋友的故事。它有两个主题,一是写他们的真诚友谊;第二,是写王六郎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一天,王对许说:“明日业满,当有代者,将往投生。”第二天,“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但是妇人却没有沉下去,反而上岸,抱着儿子走了。当晚六郎照常来河边聚会,许向他询问,六郎回答说:“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作为一个溺死鬼,当有人做替身,自己可以重新获得生命之时,却甘愿放弃,而把它让给更需要生命的人——一个手抱婴儿的妇女,他的行为多么高尚啊!

乐于助人、见义勇为是蒲松龄很看重的品质,这在《聊斋志异》中也经常得到表现。如《纫针》中的夏氏是一寻常的商人妻子,路见范氏、纫针母女痛哭,询问得知少女纫针因父欠债要被逼为人做妾,夏氏顿生同情之心,允诺将尽力帮助她们。她千方百计筹措银两,典当物品后仍不够三十金,她向母亲求借。但当她凑齐银子时,不幸又被强盗掠去,她为无力解救纫针而感到愧对纫针母子,遂悬梁自尽。后来夏氏在坟中为雷霆所震而复活,纫针却在夏氏墓前痛哭被雷击而死,遂被葬于夏氏之墓。此后盗贼遭雷击死,所盗银两被追回,经大难死而复生的夏氏侠肠未改,将追回的银两依然送与纫针之母范氏,让她用以还债。后纫针墓又被雷击开而得以复活,她知恩图报,愿终生服侍夏氏,而夏氏坚辞不受,强行将其送回家。舍财舍命救助他人,却不受任何报偿。在夏氏这个普通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无私助人的美德,这和墨子所提倡并践行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不是一脉相承的么?

还有一点需要我们加以注意,诚如郑春元先生在文章中所言,《聊斋志异》中的施助者与被动者大都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像夏氏与纫针一样往往都是素不相识的路人。他们古道热肠,以帮助他人为己任,这也完全符合墨子所提倡的“兼爱”精神。

宁宗一先生在《艺术与道德并存——读〈西湖主〉随想》一文中,曾对蒲松龄的仁爱情怀有所评论。他在肯定了《聊斋志异》的其他主题后说:“但是,不容否认,在《聊斋志异》中,爱,尤其是爱人、与人为善、恻隐之心,却是它的另一部分代表作的基本主题和中心思想。在作者笔下,爱的神经是那样灵活敏锐,爱的触角又是那样无所不至。……正是在这种爱中,我们感觉到了导人向善求真、去丑求美的一种动力。”^[7]可谓是真知灼见。

如上所述,如果说墨子的“兼爱”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蒲松龄,应该是合乎实际的。

三、墨子的任侠意识与蒲松龄的侠义思想

鲍鹏山先生在《鲍鹏山说墨子》一书中说得好:“如果说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是一位淳淳善诱的老者,那么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更像一位仗义执言的大侠。”^{[8]27}

墨子具有舍己为人、急公好义的侠义精神,在墨子的学说里,处处渗透着“侠”的观念。他将此精神概括为“任”,亦即“任侠”之意。在《墨子·经上》中,墨子对任侠精神作出规范:“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意即说哪怕做对于自己有损害的事情,也要解救他人的急难,也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济困,墨子的任侠精神其实质为爱他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度利他精神。墨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9]1204}

墨子一生提倡“非攻”,反对掠夺性的、非正义的战争,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据《墨子·公输》记载的墨子孤身一人止楚攻宋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就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又需要何等的弥天大勇!所以,侯外庐先生《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直接称墨子为“墨侠”^[10]。鲁迅则称:“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11]白寿彝《中国通史》:“侠义之士实为墨家后学。”^{[12]1172}

墨子和其墨家子弟依仗自己所信奉的道义,不惜以武力违犯法禁,气节刚烈,反抗压迫,包括反抗国家法令,这在儒家是所不为的,而墨家却义无反顾。姑不论其行为的正确性与否,仅就这种重然诺的优秀品质,这种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这种可歌可泣的血性,实在是值得我们这个民族去继承和发扬的。

表现墨家侠义精神最经典的例子当属孟胜之死。孟胜曾任墨家钜子,他宁肯牺牲生命也要践行诺言,为阳城君守城,而其手下的一百八十多名墨家弟子,纷纷跟随孟胜,慷慨赴死。孟胜及其弟子的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献身精神是足以感动后人的。任继愈先生称之为“这是有一股游侠的劲头的”^{[13]519}。

尽管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但鲍鹏山先生还是断定汉初著名的“田横五百

士”慷慨赴死,一定是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的。他这样说:“我一直怀疑田横这个故事跟墨家有关,一直想找到证据,可是现在还没有找到。都是后来我一想,田横这个人是不是跟墨家有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墨家这样悲壮的精神,血性的精神,一定是影响到了田横。”^{[8]75}笔者也认可鲍鹏山先生的判断。

墨家坚持以大义引导任侠精神,从而对中国几千年的任侠文化起了主导作用,这种任侠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代士人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使得他们从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中挣脱出来,达到一种新的精神自由,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超越。因为儒家是讲究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而任侠精神则是对这一正统秩序的破坏。受墨家任侠精神影响最典型的当属汉代的司马迁,尽管司马迁表面上并不重视墨子——这当与汉代独尊儒术的大环境有关,在《史记》中也没有单独为墨子作传,仅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对墨子有寥寥24个字的介绍而已,但从《史记》中对有关人物的描写和评价,特别是司马迁单独大书特书《游侠列传》看,司马迁对墨家的任侠精神是认可和赞扬的,他在《游侠列传》的开首就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4]722}其实,这样的评价,移之于墨家也是完全恰当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蒲松龄是一文弱书生的形象。清人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称其是“恂恂然长者”,即温和善良一谦谦君子。但蒲松龄的思想意识和性情品格也是复杂和多侧面的,像侠义精神就是其人格精神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侧面。蒲松龄从年轻时就对侠文化充满兴趣,他在《题吴木欣〈班马论〉》中说:“余少时,最爱读《游侠传》,五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他非常喜欢读《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可见他对“侠义”主题的热衷。当然,其家世中也不乏侠义精神的基因,如其高祖蒲世广就颇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性格,据说他曾用掷钱的绝技赌赢一个和尚,为族人挽回了损失^{[5]99}。相信这对蒲松龄也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蒲松龄本身和墨子一样,同情弱者,急公好义。他曾多次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完全是出于一腔正义之情而为民请命,一不怕得罪朋友,二不怕得罪权贵,表现了一个正义知识分子的磊落侠气。其最典型的义举就是以布衣之身,敢于为民请命,抗颜犯上,和淄川官吏康利贞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康熙四十八年(1709),淄川漕粮经承康利贞妄造杂费名目,勒索乡民,粮价

由原来的已经很高的每石一两六钱增加至每石二两一钱,遂引起全淄川纳粮户的强烈不满。时蒲松龄已是七十岁高龄,虽是一介书生,无职无权,他仍然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与康利贞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斗争。

蒲松龄先是向县里送上《恳减米价呈》,没有效果后,又会同几位秀才向康利贞当面质问,康利贞以言语支吾搪塞,声称事不在己。蒲松龄一气之下撰写了《请明米价呈具布政司》呈文,向做馆的老东家毕家借了车马,亲自去济南布政司告状。康利贞闻讯害怕,携带所征银两跑到德州躲藏不归。

次年春,蒲松龄又先后向兼属淄川的利津县知县俞文瀚(时淄川知县韩遇春病逝)和新任知县吴堂连写数信,请求主持正义:减免漕粮,并革除康利贞:

惟去年念荒米贵,费至一两六钱,此即从来最多之极数。今经承康利贞忽派至二两有余。窃思漕粮如故,何忽暴贵至此?……小民有尽之血力,纵可取盈;蠹役无底之贪囊,何时填满?生与某年某月,曾与利贞对众面质,逐款指其杂费之妄,伊亦遁辞智穷。……生性古拙,不善刁讼。是非真假,敢与当堂对质。……恳祈老父师出盖世之聪明,造福于淄,无以摄篆之民视为膜外。略一留神,真伪自辨。如使漕累全除,固世世留甘棠之爱;若得弊端稍去,亦人人感慈母之仁。

——《又投俞县公呈》

为恳遵宪典,永革蠹役事:窃照漕粮经承康利贞,乃淄之积蠹也。……蒙老父师神明烛奸,知其利害营谋,非奉公守法之人,革去经承,为淄除害,生等不胜欣幸。……呈祈老父母剪恶除根,永行褫革。庶淄民之膏血免归蠹役之囊橐,万姓欢呼,感戴宏慈矣。

——《求革蠹漕康利贞,呈投吴县公》

在蒲松龄矢志不渝的斗争下(仅为此撰写的呈文就有近十篇之多),康利贞终于于康熙四十九年四月被罢免。一介平民蒲松龄几乎凭一己之力为民除害,扳倒了害民的大官僚。其侠义之举,其英风豪气,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虽不能和孤胆英雄墨子千里迢迢止楚攻宋的盖世壮举相提并论,但从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份正义感和侠义精神,又何其相似!

蒲松龄曾评价自己说:“弟素不达时务,惟思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其子蒲箬也说:“惟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如饴,而苟其情乖骨肉,

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而友亦谅我父之天真烂然，不以为迂，盖不以情胜义，而肝鬲倾吐如此。”^{[4] 283}均道出了蒲松龄天性中正直侠义的一面。

而在其精心结撰的巨著《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的侠义精神也就得到很鲜明的体现。尽管《聊斋志异》并非单纯表现侠义内容的小说集，但他仍然以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和渲染了侠义精神，塑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侠义形象。在这些侠义人物身上，体现了蒲松龄所提倡和赞许的如扶危济困，锄暴安良；受恩必报，誓酬知己；重信守诺，言行信果等高尚品德。应该说，这些侠义精神无不体现了墨子所倡导的“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的原则。正如郑春元先生所言：“《聊斋志异》中的侠义之士都按墨子的‘损己而益所为’的做法和原则行事，牺牲自我来帮助他人，他们堪称风节高尚的墨侠。他们的助人行为已经不是简单与己无损的举手之劳，而是要付出重大的代价，甚至做出舍弃生命的重大牺牲，但他们都甘愿为之，做出惊天地泣鬼神之举。”^[16]《聊斋志异》中这方面作品甚多，如：

《王六郎》：溺鬼王六郎为了让抱孩子的妇女和孩子活下来，自己放弃了投胎托生的机会。

《水莽草》：祝生宁可自己永远为鬼，也不肯用别人的死来换取自己的生，并且长期坚持为他人驱鬼，保护他人的性命。

《柳秀才》：柳树神为乡民们民庄稼不受蝗虫侵害，甘愿自身承受蝗神的报复——“后蝗来飞蔽天日，竟不落禾田，尽集杨柳，过处柳叶都尽”。

而《聊斋志异》所有作品中，最具墨家“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精神的当非《田七郎》莫属，小说的主人公田七郎完全就是孟胜一流人物。孟胜感于阳城君的知遇之恩，为之舍命守城；田七郎也是用生命报答武承修的知遇之恩。据互联网报道，由山东宣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五色祥云（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淄博市广播电视台台拍摄的影片《田七郎》，其故事情节就将墨子与蒲松龄笔下的田七郎联系了起来。该片剧情梗概为：相传墨家自墨子之后，以一把“青鹏剑”作为信物传于历代钜子。后墨家发生内乱，青鹏剑化作一只鲲鹏，销声匿迹。上千年来“青鹏剑”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主人，直到传至田七郎手中。

尽管蒲松龄屡屡提及司马迁的侠义思想对其的影响而始终没有提及侠义思想的“始作俑者”墨子，但其者内在的联系，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端倪的。

四、墨子的“尊天明鬼”思想与蒲松龄的鬼神观念

墨子在“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主张外,还明确提出“天志”和“明鬼”思想。其天志明鬼思想源自于其兼爱思想。在墨子看来,人要“尊天”,即遵从“天志”,“天志”既是“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是“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墨子·天志上》)。其“天志”也可以理解为墨家思想所价值观遂推崇的“义”。墨子认为,“天志”是人间善恶是非的最高标准,人们的言论行为都要受到“天志”的审查和裁决,即使王公大人也不例外。“天志”对一切人都具有赏罚功能:“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

墨子主张“明鬼”,认为鬼能赏善罚恶,他认为天下之乱皆是“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墨子·明鬼下》)。因而欲“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则必须明辨鬼神之有无。在墨子学说中,鬼神的作用和“天”大致相同,都是有意志的,都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所不同者,只是天是最高的主宰,而鬼神是天的辅佐,天和神一起承担着赏善罚恶的职责。

总而言之,墨子的尊天明鬼思想并非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或低级的迷信观念,实则是墨子用以警戒世人特别是统治者的一种精神武器。他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在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这种力量无处而不在,无时而不有,它维护着正义,赏善罚恶。墨子的真正目的是想借助超人间的权威和力量来制约当时统治者的残暴统治,来实现人间的正义。

儒家对鬼神的态度和墨家有所不同,可以说是模棱两可,至少是不热衷,“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而在这方面,蒲松龄和墨子比较接近。众所周知,蒲松龄是相信鬼神并热衷谈鬼神的,他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他的《聊斋志异》堪称一部“鬼狐传”,书中写了大量的鬼神故事,塑造了众多的鬼神精怪形象,这当然绝非仅仅是为了猎奇,而是有所寓意和寄托的,“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当是由衷之言。其子蒲箬在《祭父文》中说得很明确:“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各数万言,……大抵皆愤抑无聊,借以抒

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谈谐调笑已也。”^[4]蒲松龄的好友唐梦赉也说过:“今观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15]¹¹⁷

可以说,蒲松龄是在《聊斋志异》中,把墨家的天鬼赏罚、惩恶扬善的主张通过鬼神狐精等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加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了。

《聊斋志异》中劝善、扬善的主要方式就是告诉人们“善有善报”。他在《贺毕反予公子入武庠序》中说:“大善得大报,小善得小报,天道好还不爽。”他肯定、赞扬了众多具有仁心善行的人物,并让他们都得到美好幸福的结局。如《张不量》中:“张素积粟,家甚富,每春间,贫民皆就贷焉。偿时,多寡不较,悉内之,未尝执概取盈,故乡人名之‘不量’。”因其心地仁厚,乐善好施,所以雹神也对他另眼相看,他人田中“摧折如麻,独张氏诸田无恙”。蒲松龄还特别强调了一种“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思想,有人只是施舍给人一顿饭,结果也得到了好报。如《雷曹》中,乐云鹤在旅舍中见一人面有饥饿之色,遂“推食食之”,而他不知此人乃天上雷曹。后来,雷曹在乐云鹤面临覆舟之际救了他的性命,又从水中捞出了乐的所有财物。后来又携乐云鹤到云中一游,乐从天上带回的小星星也托生成了乐的孩子,解了其乏嗣之忧。

劝善就要惩恶,惩恶也是劝善的一种手段。作者笔下的坏人可能得意于一时,但最终的下场往往都不妙,或当世遭罚,或来生受罪,从而对世人起警戒作用。如著名的《潞令》篇,潞城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藉于庭”,“后半年,方据案视事,忽瞠目而起,手足挠乱,似与人撑拒状。自言曰:‘我罪当死!我罪当死!’扶入署中,逾刻寻卒”。凶残不仁的官吏无病暴死,终于得到恶报,读来真是大快人心。类似的还有《续黄粱》《梅女》等篇。

在蒲松龄的笔下,利用鬼神进行赏善罚恶和墨子的主张思路基本是一致的,而其表现形式无疑是更丰富、更艺术化的,正如郑春元先生所言:“如行善者可以成仙,可以得到官职、功名、财产、子嗣、婚姻等;罚恶有失财物、遭劫掠、得恶疾、受酷刑、变禽兽等。描写的处罚方式具有可怖性、痛感性,还有一定的捉弄性、喜剧性,使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起到很好的劝诫作用。”^[16]

五、墨子的商业思想与蒲松龄的商人意识

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农本商末”“重农抑商”观念是中国传

统经济思想主调。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员组成为“士农工商”，商人总是排在最后。另外更重文轻商，崇尚“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最瞧不起经商。比如汉代的司马迁就说过：“行贾，丈夫贱行也。”^{[14] 757}这种对商人的轻视一直到了明代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才逐渐有所改变。

儒家思想是以言利为耻，鄙薄经商取利，故很少论及商业活动，而墨子则不仅为商人正当的商业活动进行辩护，对商人的勤劳和智慧加以赞赏，而且为商人争取平等的政治地位。墨子本身就是小手工业生产者，从事的就是商品生产，墨家的很多成员也都是商品生产的从事者，他们深谙劳动者的艰辛，也明白勤劳致富的道理。在亲身的实践中，认识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所以墨子和墨家对商人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

墨子认为生产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墨子·非乐上》）墨子认清了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历史的必然，故强调社会物质生产的分工合作，以利相交。墨子说：“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墨子·耕柱》）

墨子认为商人是很辛苦的：“商人之四方，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墨子·贵义》）墨子认为商人也是很精明的，他们能够赚到钱，靠的是智慧。在墨子看来，甚至很多知识分子都不具有商人之“慎”和商人之“察”：“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市，不敢继苟而售焉，必择良者。今士之用身则不然，意之所欲则为之，厚者入刑罚，薄者被毁丑。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墨子·贵义》）“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倍蓰，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墨子·贵义》）墨子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山东淄川，他所生活的时代，商业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其家乡淄川一带是齐文化发祥地，而齐文化是重利务实的，一向就有重经商的传统，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就是由儒生后改做商人的。蒲松龄自幼耳濡目染，对商人和经商有较多的了解，他对商人的看法也与传统观点有所不同，而与墨子的看法则多有契合。蒲松龄虽然一生追求功名，十分看重“仕”途，但他并不鄙薄轻视从商。这和当时商业的发展、晚明进步思潮和“三言”“二拍”等文学作品的影响有关，与他的父亲弃儒经商也有一定关系。蒲松龄能平等地看待士、农、

工、商各阶层,他肯定商人追求利润的合理性,认为商人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在《聊斋志异》一些作品中,肯定了商人在商品流通中所付出的辛劳。

据蒲松龄研究专家于天池先生统计,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中,写到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人公的故事约有七十多篇,约占全部作品的六分之一,仅次于对读书士人的描写^[17]。而《聊斋志异》所描写的商业经营也是丰富多彩,五花八门,有行商,有坐贾;有大商人,也有小商贩;有长途贩卖,也有泛海远航;有经营旅店客栈的,也有从事中介如牙行、典当的;有开手工业小作坊的,也有开采煤矿的等等,不一而足。

蒲松龄在小说《赌符》中说:“夫商农之人,俱有本业。”他是自觉不自觉地吧商人排在农民前边,他认为商人也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经商也是艰苦的劳动。他在《王十》篇中的“异史氏曰”中,对贩盐小贩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且夫贫难军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盗,下知耻而不媚;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尽此民,即夜不闭户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而在《雷曹》《罗刹海市》《房文淑》等篇中,他还以大量笔墨叙述了多个读书士人弃儒从商的故事,也描写了许多商人得到仙人青睐和帮助的有趣故事。

在《黄英》篇中,他通过小说人物陶生之口直接为商人辩护。小说写保守文人马子才自命清高,有轻视经商的思想,他喜欢菊花,也很佩服黄英、陶生姐弟种植菊花的才能,但当陶生与之商量卖菊为生时,他却嗤之以鼻:“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而陶生则义正辞严地反击之:“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以苛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陶生对于经商的观点,表现了鲜明的商人意识和新时代的潮流:经商是自食其力的正当职业,既不贫,也不俗。这应该也代表了蒲松龄自己对于经商的观点。而在小说的最后,一向瞧不起经商的马子才在黄英姐弟的批评开导和在事实的教育下,也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原有观点,而对陶氏姐弟的经商行为表示了认可。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不少正面的商人形象,这些商人中也大多是小商贩,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待人正直、诚朴,买卖公平,乐于助人。如“一贫彻骨而至性不移”、拾金不昧的王成(《王成》),纯厚质朴、善良守信的廉生(《刘夫人》),洁身自好、乐善好施的乐仲(《乐仲》)等。正缘于此,作者往往让他们获得奇遇,或获得神仙的青睐,或得到异类的帮助,使事业成功。

更可贵的是,蒲松龄在许多篇章中,对下层的商人特别是小商贩的生活状况

给予了真实的描写,描写了他们经商的艰苦酸辛,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如《王十》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在《王十》篇中,蒲松龄明确主张在商贸交易中要“平准”,反对官商垄断盐业,赞成小商贩买“私盐”,并对官府的盐政给予尖锐的批评,对下层盐贩寄予了深切同情。

……呜呼!冤哉!漏数万之税非私,而负升斗之盐则私之;本境售诸他境非私,而本境买诸本境则私之,冤矣!律中“盐法”最严,而独于贫难军民,背负易食者不之禁;今则一切不禁,而专杀此贫难军民!且夫贫难军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盗,下知耻而不娼;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尽此民,即夜不闭户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呜呼!上无慈惠之师,而听奸商之法,日变日诡,奈何不殍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蒲松龄生长在海国山东,深知盐法之弊,贫民竭锱铢之本贩点盐以求升斗之息,有何不是,却偏要治罪。暴官奸商,上漏国税,下蠹民生,真是其罪不可胜数,却反得逍遥法外,这是何等的不平?所以,他在《王十》中有极公允的处置:在阴间,许多大盐商都勒令下水淘河,小盐贩则站在河岸上监工,有怠惰的便用骨朵敲打,这足可为小盐贩们出一口气了。

六、蒲松龄和墨子都是实干家

先秦诸子中,墨子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既具有高尚的理想,又身体力行之。这一点和那些高高在上、一味坐而论道的学者们来相比,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墨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下》)即人要言而有信,反对只说空话,不务实际。他说“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墨子·耕柱》)。在《修身》篇中说:“务言而缓行,虽辩不必听。”“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墨子的生活异常节俭,一生奔波忙碌不休,以身赴义,不是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就是穿着草鞋周游列国,止战非攻,或是从事工匠劳动,进行科学实验。他的衣服是黑色的,他的面容也是黑色的。“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苦为极。”^{[18]496}他是异常忙碌的,班固称他“孔席不暖,墨突不黔”^{[19]2016}。

古代许多人物对墨子和墨家学说可能持反对态度,但对墨子一生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辛苦奔走的实干精神,都是不吝赞美之词的。作为墨子的死对头,孟子就曾这样夸奖墨子:“墨子兼爱,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为之。”^[20]²¹³庄子也非墨,但他叹服墨子的高尚人格:“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18]⁴⁹⁶墨子以天下为己任,“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社会责任感,“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自我牺牲精神,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实干精神,感染着一代代追求精神人格的后人。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说:

我们研究墨子,不但是研究他的学说,最要紧是研究他的人格。论学说呢?虽然很有价值,但毛病却也不少。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唯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世界也是少见。……墨子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以为知而不行,便连知都算不得了。^[21]²⁰⁰⁻²⁰¹

毛泽东同志也高度赞扬墨子的实干精神:“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22]

墨子是可贵的实干家,蒲松龄亦是如此。

作为封建时代的饱学儒生,蒲松龄身上有着较多的乡土气,而较少封建文人的士大夫气,因为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老死于农村,而且一直过着贫苦的生活。蒲松龄和墨子一样一生布衣,他有着和墨子一样的忧世救民情怀。墨子的一生都在为扶危济困、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而辛劳奔走,蒲松龄虽然没有像墨子止楚攻宋那样可以大书特书的英雄壮举,但他同样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来救世济民。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松龄绝非独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书生,和墨子一样,也是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事的令人钦佩的实干家。

蒲松龄是热心肠的人,村子里修桥补路、乃至婚丧嫁娶大小事情,他都非常关心;建庙修殿等各种善事,他都积极参与。他的文集中收录了大量的募修序文。

蒲松龄的眼睛关注着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心急如焚的他用手中的笔真实地记录着严酷的灾情、流离失所甚至买儿卖女的难民,让我们自然想到杜子美的《三吏》《三别》:

大早已经年,田无寸草青。大风折枯蓬,垆头黄埃生。五月行复尽,宁犹望西成?壮者尽逃亡,老者尚啾嚶。大村烟火稀,小村绝鸡鸣。流民满道路,荷篋或抱婴。腹枵菜色黯,风来吹欲倾。饥尸横道周,狼藉客驂惊。我行至旧村,邻半为逃氓。官慈盗日多,日落少人行。父老对歔歔,愁旱心煎烹。尤恐

天雨降,晚田无人耕。

——《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

何处能求辟谷方,沿门乞食尽逃亡。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

——《饿人》

他用犀利的语言揭露、抨击不关心人民死活甚至谎报民情的当权者:

于今盛夏早如此,晚禾未种早禾死。到处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犹未止。

——《午中饭》

有道天王自圣明,南漕百万济苍生。大人已报当年初富,五月横尸满郡城。

——《历下》

蒲松龄除用手中笔做了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应该做的,他还为乡亲们仗义执言,做了许多绝大多数读书人做不来的正义之举,像上面提到的蒲松龄为漕粮加价而与贪官康利贞作斗争之事即是一例。民以食为天,粮价高低是普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蒲松龄从民众利益和后代子孙利益着想,唯恐漕粮加价,永成定例,贻害无穷,所以不惜得罪权贵,坚持斗争,寸步不让,的确让人感动。下面的另一例子也同样让人感佩不已。

康熙二十三年,蒲松龄看到自己年轻时曾给其做过幕僚的老上级孙蕙官越做越大,其族人亲戚、仆人在乡里飞扬跋扈,仗势欺人,他出于一腔义愤,不顾得罪老朋友、老上级,撰《上孙给谏书》。他在信中慷慨陈词,向孙蕙提出身为乡绅者应当注意的几件事情,即要“择事而行”“择人而友”“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等,到了信的最后,蒲松龄语气也毫不客气:

凡此数者,皆弟之所目击而心热,非实有其事所不敢言,非实有其人所不敢道也。弟之言无可凭信,即先生问之他人,亦必以余言为诬,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栗,诚不知其可矣。

收到信后的孙蕙也的确“严发禁示,以戒族人”^{[15]117},但蒲松龄与孙蕙的多年友谊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甚至说绝交也可以,因为孙蕙最终没有给蒲松龄回信,两年后孙蕙病逝于家中,蒲松龄也未前往吊唁,甚至连挽诗也未作一首。刚直而颇具侠义之心的蒲松龄,为了乡里百姓,不惜冒着和老朋友绝交的危险,仗义执言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此事在当时曾广为传颂,他也因此赢得了淄川乡民的

敬重。

中年以后的蒲松龄,更是不遗余力地造福当地百姓。他有感于乡民们文化知识匮乏,写下了众多的杂著,努力向农民普及各种文化知识。诸如《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农桑经》《蚕经》《药崇书》等等。举凡乡民们需要的如种桑种地、医病取药、婚姻嫁娶、看气观测,他都有著述。比如针对乡亲们缺医少药的现实情况,他专门写了《药崇书》,他在《〈药崇书〉序》中说:“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

蒲松龄还面向普通民众,利用淄川一代流行的民间曲牌和方言土语,为平民百姓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的俚曲,诸如《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等等,据盛伟先生编校的《蒲松龄全集》载,就有十五部之多,字数近百万字,几近蒲松龄全部著述的二分之一。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曾由衷地赞道:“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使其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匍于一编之中。呜呼!意良苦矣!”^{[4]283}

像《日用俗字》《农桑经》这样面向下里巴人的杂著,特别是像俚曲这样的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民间文艺作品,试问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又有哪一位文学家能像蒲松龄这样孜孜矻矻地笔耕不辍而达百万字之巨呢?白天要辛苦教书以养家糊口的蒲松龄,大概只能在晚间的小油灯下,日复一日地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吧?这又该需要多大的毅力,这和“摩顶放踵”的墨子老先生不是很有几分相似吗?

蒲松龄在关心下层民众并为下层民众做实事方面,可能是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文人都赶不上的。汪玢玲先生在《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一书中,直接称其为“人民艺术家蒲松龄”^[23],这应当是不过分的。

墨子一向被称为伟大的平民圣人,其实蒲松龄也被称为“圣人”。周扬同志五十年代来山东考察时曾说过,山东是“前有孔夫子,后有蒲松龄”^[24],而据涌泉山人2017年3月17日博客文章《毛主席称蒲松龄是圣人》一文介绍,1969年9月下旬,毛泽东同志乘专列南巡后到达济南,召见当时山东省主要负责人、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等,在汇报工作的间隙,毛主席曾同王效禹聊起山东共有几位圣人的话题,毛主席说,你们山东还有一位圣人,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蒲松龄是真正的圣人。和“至圣先师”孔圣人相比,蒲松龄则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平民圣人、草根圣人,这一点和墨子又是多么的相像啊!

七、结语

作为一代宗师,墨子开创的墨家学说原是与儒学并列的一代显学,时有“非儒即墨”之说。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显赫一时的墨家学派至秦汉骤衰,一蹶不振,终至湮灭,遂成绝学,令人扼腕叹息。不过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墨子对后世的影响却没有随着墨家学派的湮灭而消失。邢兆良先生在《墨子评传》一书中说得好:“墨家作为一个学派是湮灭了,但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人格道德力量、科学思想和方法却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之中,在思想上、精神上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5]352}

庄子在《养生主》中有言:“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18]47}照明的烛薪终究会燃尽,但火种却会流传下来,永远不会熄灭。尽管由于儒墨对立的大环境,后代的文人墨客或曰“儒生”们都有意无意地疏远墨子和墨家(当然也有个别的如唐朝的韩愈曾提出“孔墨相用”较为客观持平的观点,但毕竟是凤毛麟角),但正像上面邢兆良先生所讲的那样,墨子和墨家的思想却像火种一样,仍实实在在地在不同程度上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着后世的知识分子们,蒲松龄自然也不例外。我们没有找到蒲松龄正面评价墨子的文字,甚至他连墨子的名都很少提及过,但正如本文所粗浅之论述,作为同是闻名齐鲁大地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在蒲松龄的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了墨子对其潜移默化之影响的,二人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在许多行为上也是相似的。而这,也的确是令我们欣慰不已的事情。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 [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M]//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4]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 [5]郭大伟,赵晶.谈《聊斋志异》中人品与文品的一致性[J].蒲松龄研究,2003,(3).
- [6]马瑞芳.蒲松龄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7]宁宗一.艺术与道德并存——读《西湖主》随想[M]//聊斋志异鉴赏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下转第 61 页)

reflects the situation of the Qing soldiers massacred the people and supplements the history missing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use “strange” to write current affairs,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novel, with the post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ve color. PU Songling interprets history in the form of “tragedy”, and his interpretation is “poetic”, full of imagination and fiction. Adding the writings of the wa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to the story of the ghosts of love and using of irony and rhetoric of the metaphor so that “Gongsun Jiu Niang” is full of reading tens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Narrative; *Gongsun Jiu Niang*; YUqi chaos; tragedy; irony

(责任编辑:朱 峰)

(上接第 36 页)

- [8] 鲍鹏山. 鲍鹏山说墨子[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 [9] 刘安. 淮南子(下)[M]. 陈广忠,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10] 侯外庐. 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J]. 历史研究, 1984, (3).
- [11] 鲁迅. 三闲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12] 白寿彝. 中国通史(第四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13] 任继愈. 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4] 司马迁. 史记·游侠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5] 袁世硕, 徐仲伟. 蒲松龄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6] 郑春元. 略论《聊斋志异》中的墨家思想[J]. 蒲松龄研究, 2017, (1).
- [17] 于天池. 《聊斋志异》所反映的商人生活及蒲松龄的商人意识[J]. 蒲松龄研究, 1993, (1、2).
- [18] 曹础基. 庄子浅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9] 班固. 答宾戏[M]// 箫统, 编. 昭明文选(第五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0]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21] 梁启超. 老子、孔子、墨子及其学派[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6.
- [22] 郑林华. 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J]. 党史博览, 2018, (1).
- [23] 汪玢玲. 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24] 严薇青. 《蒲松龄全集》序[M]// 盛伟, 编校. 蒲松龄全集.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8.
- [25] 邢兆良. 墨子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朱 峰)